

汉文帝刘恒

王泽

自然界受地球太阳周期的影响，总体是周而复始，大循环套小循环。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也大体这样。对应有史记载的悠久文明而言，这种周期非常清晰，一方面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世跟样学样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复辟的，然后“气数已尽”再来一个周期；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影响也不可忽略。比如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衍盛或是饥荒引发各种人口大迁徙之类。对于相对封闭的文明，由于缺乏可持续的制度和自我修复的机能，时代兴衰，此起彼伏，在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出现之前总是不可避免的。汉是中国最为强大的王朝之一，也是极度集权的开始阶段。秦开创极度集权的先河，汉承秦制。汉之初的统治精英都是秦和六国的遗族，当时儒家受秦始皇打击还未恢复元气，所以总体上还是兼有各家之术。汉初盛行黄老之术跟统治集团的智囊有关。这些人大多是暴秦的受害者（其实秦的制度唯一得益者是国家机器，那种极端集权到最后连皇帝都成了牺牲品）内心都是极力抗拒秦的暴政也就是极端严苛和没人性的各类律法和刑罚。刘邦并非草莽，起事前做过亭长，所以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汉初三杰之中只有韩信被吕雉与萧何设计杀害，被杀以后刘邦才知道还非常后悔，另外两个（萧何与张良）都得以善终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委以重任。萧何被下狱一次，即便没有人求情，刘邦也不会杀他，只是给以恩威并施，否则一个小小侍卫怎么能改变刘邦的主意？萧何出道早名气一开始比刘邦大多了，刘邦是他下属多次靠他庇护才免于受罚。后来起事反而推举刘邦，主要是读书人缺乏独当一面的胆略，所以刘邦很早就知道萧何是一个好助手而没有谋反之心。萧何本身的治理能力就很强，灭秦之后他首要目标就是秦朝府库内的各种内政资料，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这样就完全知晓了全国的地理行政与郡县户口，可谓了如指掌。比诸葛亮隆中对更具实际意义。对刘邦取胜至关重要。刘邦老家沛县为楚地近齐国，黄老盛行于齐，估计刘邦两大要员萧何与曹参很早就接触到这种道家思想。汉初的黄老应该说是秦制的补充是额外的“人治”，法律方面还是秦的那一套。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基本上就是照搬秦律。黄老之术由曹参（萧规曹随的那位大佬），张良（策划用大锤刺杀秦始皇的那位），吕后等人延续到汉文、景两帝达到高峰。政策的高度延续性和汉初对功臣的总体宽容性导致了汉初乃至整个汉朝的荣盛。汉文帝就是这一鼎盛时期的关键接力者。

本文的起因是汉文帝的陵墓最近在西安被发现，一时兴起将个人了解的几点故事罗列一下，做为饭后茶余的谈资。主要讲述的有汉文帝的生平，主要治国之术，孝、简与仁。史书对汉文帝推崇备至，他本人还是二十四孝中的第二名，他的陵墓传说在另一地方，这次发现在江村，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又一次证明了千年传颂的史书有很多不可靠的地方。

刘恒的陵墓叫“霸陵”。汉文帝一生谨小慎微非常低调，怎么会选择“霸”字作为他坟墓的名字呢？其实这是望文生义或者说因为汉字简化导致的误解。霸字来源于灞河。另外皇陵的名字是皇帝死后才取的，不反应皇帝自己的意志。正如汉文帝（全称是太宗孝文皇帝）这一头衔一样也是死了才有，生前都只称皇帝，普天之下唯我独尊。太宗是庙号，是死后归入重要级别祖宗时才有的。庙号兴起于商周，当时掌管太庙的人地位非常高，最高统治者通常不敢随便动这些人。

这跟西方文明是一致的。汉之后庙号开始泛滥，相对而言重要性下降了。孝文是谥号。孝来源于周，原意是最高的德行，以孝为谥号的都是有为之君。后来慢慢降格为孝顺父母的意思。汉朝谥号带“孝”始于第二个皇帝汉孝惠帝。惠帝刘盈是吕后的儿子，受刘邦拖累自小朝不保夕，无数次间隙被杀被废，其中两次是刘邦为了保自己的命将刘盈姐弟俩从车上踢下去，立为太子之后也是很多次差点被废，幸亏他母亲吕雉操作得当，最终当了皇帝。这种从小在生死边缘行走又有强势父母的人要么很残暴要么非常懦弱。史书对不得势者通常是忽略不计的或者是故意用春秋笔法抹掉他们的功绩。其实刘盈在位时已经是成年，很多重要的事还是他决断的。比如奉黄老之术，减税，减少刑罚，开通商业，修筑长安城，去除秦始皇的焚书令，让 15 岁以上女子尽快出嫁以增加人口等等都是后面文景之治的基础。实际上刘盈与吕雉的联合统治时期汉朝已经国立大盛，不一定比文景时期差。刘盈死后，谥号带“孝”字一是符合他的品行，第二估计是吕雉想借此传递信息“我还是皇太后，后辈要对我孝顺忠诚”。之后的大部分汉皇帝的谥号也都带上了孝字（个别除外比如光武帝）。

吕雉嫁给刘邦后是九死一生，朝不保夕，刘邦做王以后也几次三番要废太子，废掉太子吕雉也是死路一条。长期高度恐慌之下吕雉想必心理会出现问题，报复心也会很强。刘邦死后吕雉第一件事是想族灭那些跋扈的权臣，但她还算有理性接受了建议防止了国家大乱。第二件事就是大力整肃她的情敌。汉文帝刘恒是庶出，生母薄夫人也不怎么受刘邦待见，也没有什么家族势力。刘恒因此反而得福得以离开京城去了偏远的封地代国。等吕雉病死后，汉朝的权臣与皇族联合剿灭了吕氏集团，然后挑选皇位继承人。庶出，身居偏远地带，母系没势力，自己谨小慎微的名声都成了刘恒的优点，因为这样的候选对功臣的威胁最小（汉武之后霍光选汉宣帝即位也是这种考虑）。刘恒不比刘盈。刘恒出生时刘邦已经势力丰满，生活上应该没有问题。薄姬为普通嫔妃而且势单力薄，如果刘盈不早死，刘恒估计终老一生也没有机会做皇帝。这种劣势反而让刘恒能安安稳稳在代国呆了 16 年，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读了很多书，这给他后来顺利当政埋下了伏笔。

当馅饼从天而降以后，代王刘恒先是惶恐不安，遍问代国群臣，问其母亲，最后还是靠卜卦才决定。得到吉卦之后还是不放心想等到亲舅舅去打探了权臣的口风之后才最终动身去长安。所谓吉卦（“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有可能是事先做好的，古代有很多例子，以鬼神之口可以很好地压制别人猜疑。之后他的一系列措施便反应了他的权谋之术。部分措施可能是手下奉献的，但他能采纳说明他心理很明白。达到长安之时，先是探知群臣在城外迎接才准备进程，迎接时公开拒绝首席功臣周勃的私下汇报的请求，让周“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也就是说公事公办不要藏着，避免了以后有人说他“得位不正”，然后开始表演五辞六请的游戏，群臣也深知此意，极力配合，最后一次刘恒说“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就接受天子法驾登基即位了。这番游戏就是告诉天下我本来不想做皇帝，群臣坚持要我做，实在没有办法我推迟掉，而且国家也正需要有人来领导，就恭敬不如从命给大家服务了。刘恒上台第一件事是用亲信换掉周勃来做京城卫戍司令（卫将军），用亲信取代皇宫卫队头头（郎中令），然后赏赐功臣大赦天下，这样从内到外全部安全了。第三件事就是暗示汉惠帝的后代还在恐有纷争，导致汉惠帝四个儿子全部被杀，斩草除根。吕雉做梦也没想到她的血脉会全部消失于人间。紧接着刘恒的四个儿子也全部莫名奇妙死掉。有人怀疑刘恒的正室夫人是吕氏家人，当初他因为联姻吕氏才最终幸免于难。吕氏被灭之后以及他被选上皇帝之前代王妃（刘恒的正室）正好死掉，有人怀疑是刘恒要跟吕氏划清界限求自保而不得已而为之。或者是诛杀诸吕时刘恒还是一个小国

诸侯没有任何能力违抗这种命令。在他当上皇帝之后三个月内正室所生四个儿子相继莫名奇妙死掉，有人据此怀疑是刘恒或手下为了让群臣相信他与吕氏不两立而下的杀手。依史书记载的刘恒品质，后面的两件事如果为真也不太可能是他的主意。但其它几件事有史可依也被后世当权者频频效仿，某种程度上成为后世帝王将相之术中最关键的一招。他的后代那个当了 27 天皇帝就被号称犯下千余条罪行的海昏侯刘贺之所以如此快就被废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使用刘恒的秘诀。当然刘贺或许还不知道他五世祖的这些策略。

刘恒在位 23 年，总体评价很高，被奉为贤明皇帝的典范。他的最大功绩就是让汉朝总体国力继续增强，开创了后世所推崇的文景之治。他的施政总体而言就是奉行黄老之术，延续惠帝与高后（吕雉）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汉初有如秦国，政策都有非常好的延续性。大家熟悉的“萧规曹随”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在人治社会不同统治者可以随意改变大政方针，谁都不想活在别人阴影下，都想彪炳千古变成神圣之君，以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而前朝的政策很难继续，结果当然就是老百姓遭殃。汉初的重要功臣很多寿命都很长，刘邦高后也没有滥杀，刘恒即位之后非常难能可贵地继续前朝的政策，继续总体善待功臣，接纳谏言。所以汉朝到他这一代继续平稳发展，国力持续上升。到他儿子景帝接位后，这些政策得以继续。一是他儿子也是成年即位，即位之前几乎被别人任何夺位的威胁（唯一刘启下棋误杀了吴王太子导致汉朝廷与吴王弄僵，但汉文帝也没有因此废掉刘启），因而得到了比较系统和持续的教育与培养。再加上汉文帝的皇后窦漪也奉行黄老之术，而且活的很长，所以汉初的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又有了强有力的接班人和监督者。窦漪算是寒门出身，在吕雉为皇太后时入宫服侍她，后来被吕雉赐予诸侯王。窦被赐给代王，在代国与刘恒生活了很久。与同为寒门出生的薄姬（刘恒的母亲）很融洽，可能也因此得到教育的机会。薄姬后来成为皇太后也顺手将窦漪提成皇后，连着她的家族也一并得到封赏。汉文帝死后，窦漪成为皇太后，汉初奉行的孝道使得她能够干预朝政。总体而言，她对家族的管教算严，对朝政的干预也主要是要继续推行汉初的黄老之术，所以是有益的。

汉初能长期推行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除了政策本身的优势之外还是幸运居多。汉初的主要执政者，监政者，办事的都相对长寿，相对来说形成一种共识，在缺乏法制护航的人治社会这种跨时代的统治集团的共识可遇不可求。汉文帝本身谨小慎微，处理大事基本延续以前的做法。对外（包括匈奴和外诸侯内诸侯等）都是以安抚为主，适时分散他们的力量。对最大的敌人匈奴，除了安抚之外还积极防御，启用有能力的武将备边。著名的“（冯唐）持节云中”让魏尚复职就是一例。李广也是汉文帝时开始展露头角。这可能也得益于他早年生活在靠近边境的代地的经历有关，比如他甚至战国时赵国的廉颇李牧的事迹也很想慕得类似人才。从刘邦白马被围之后，汉朝对匈奴都以和为主，守为辅。但从汉文帝开始就已经筹划打击匈奴了，后世汉武帝能多次击溃匈奴其实一是靠汉初积累的强大国力，二是靠祖宗保留下来的作战能力。他对大臣不滥杀，以德政为主。这些对外对内的政策非常顺应时势，民众安居乐业，国家也蒸蒸日上。所谓为万世开太平不过如此。所以他在位时及死后声望很高。当然古代史书春秋笔法比较严重，也有可能他的一些不那么伟光正的事迹就被抹掉了。为了尊奉他，从史记开始就对他之前的刘盈和高后都以贬抑为主。

个人品质方面汉文帝以孝和简著称。他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也就特别孝。《二十四孝》中记载“母长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刘恒自己生活非常

简约。比如当时已有布鞋，他为了表示节约，上殿理政时要穿草鞋，经常穿那些由质量较次的料子做的“绋衣”，衣服破了就缝缝补补再穿，帐子上不准带有刺绣、花边。同时要求嫔妃们衣服的下摆不准拖到地上，以节约衣料，这跟现代仿造的“汉服”完全不是一个思路。他要求坟墓要用瓦器修建，不准用金银，更在遗诏中规定不得厚葬，死后三天臣民一律脱去丧服，不准禁止百姓婚嫁、饮酒、吃肉。汉文帝的孝还被推及普罗大众，他规定对 80 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按标准发给米、肉、酒等生活品，90 岁以上增发一定的麻布、绸缎和丝棉。这些举措即便放到现在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对国民而言刘恒最值得称道的是仁。即位之前他主要生活在贫瘠并靠近边疆的代地，对民间疾苦非常了解。这些经历直接影响了他在这些方面的施政措施。在刑罚方面，他继续去除秦律中的极端不人道的恶法，比如连坐法，也就是一人犯法全家遭殃（“收孥”和相关“相坐”法）。

“肉刑”的废除跟一个叫缇萦的女孩有关，他父亲犯法当受肉刑，为了救父，她上书天子愿意没身为奴以免父亲受此惨刑并终身残废。刘恒见后得知有此惨刑很不安，就及时废除了它（史记记载刘恒诏书道“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免除农业税是刘恒做的另一大善事，后世极少有这种事。这跟汉初国力极度荣盛有关，没有足够经济基础，想做都做不了。对诸侯和大臣汉文帝都以安抚为主，即便造反的都很少直接判死刑，更不会搞连坐。每次有天灾或是大的祸乱，汉文帝都会在相关诏书中自责一番，这种做法流传到后世就是皇帝的“罪己诏”。算是汉文帝留给后代的另一项政治遗产。以致于后世皇帝如果还想让草民知道自己还是体恤民生时，“罪己诏”还是要发的。当然也有很多后世帝王对此不屑一顾，表演都懒得做。

汉文帝过人之处还体现在度量上和用人方面。他曾经去周亚夫（周勃的儿子）驻扎的细柳营慰问，结果既没有人欢迎还不让进，因为士兵没有受到将军的命令。最终周亚夫命令到了，文帝才能进军营。进去之后还不能让马快跑。在随从眼里这是大不敬，但汉文帝据此推断周亚夫治军严明值得信赖，临死还将周推荐给即将接位的儿子。他的另一项美德就是纳谏。其实自秦始皇开始的中国几个皇帝（胡亥除外）在纳谏方面都还可以。汉距战国不远，想必刘恒知晓各国的明君纳谏的历史。刘恒在这方面立了一个标杆，废除了“诽谤妖言罪”（也就是妄议朝廷罪）（史载诏书：“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有人以“贾谊难封”和不能任用季布来批评汉文帝优柔寡断，不能放手用人。贾谊很有才，一年就被提拔四次。但年轻气盛，用词不免太过恢弘英气逼人，提拔太快，终不免被元老宗室一起反对，没能被提拔成公卿重臣。刘恒依赖后者上台，是不会去得罪那么一大批人的。后来其实还是给了贾谊继续发挥左右的机会。他提的建议也被采纳了一些。季布是另外一个与权臣平衡的例子，最后发回去也算是适得其可。所以这些批评并不能说明刘恒的用人问题，充其量是各方权衡的结果。